

民間武裝組織與地方社會—— 以閩北與閩東的大刀會組織為例 (1927-1950)

羅士傑*

摘要

1950 年 10 月 10 日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相關對民間組織力量的鎮壓活動，一直到 1953 年方才足見告終。本文則以 1950 年 2 月發生在福建省平潭縣的大刀會起事為出發點，去討論以下問題：首先，1950 年平潭大刀會與解放軍對抗情形出現的意味為何？大刀會這類民間武裝組織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的福建地方發展過程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中共地方新政權為何會宣稱大刀會與國民政府殘餘勢力有因果關係？若我們把大刀會起事放入時間脈絡去進行分析，並視為地方社會成員與不同時期福建地方政權間的政治互動，這些政治互動又牽動與反映了哪些論述與權力結構的變遷？如何從中理解不同時期的福建地方政權與自民初以來流行於福建地方社會中的地方大眾組織，特別是大刀會與救世團體（同善社）間的互動關係？本文採取由下而上的歷史配合由小見大的微觀史觀點，透過具體地方歷史脈絡的梳理，意圖挑戰過往由上對下的強調「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單向政治獵巫，去重新檢視與反思大刀會作為一個民間大眾武裝組織在閩北與閩東兩地，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從民間利益捍衛者的社會型盜匪成為反動會道門的歷史發展過程。

關鍵詞：大刀會、地方武裝組織、福建地方政治、1950 年

前言

福建省檔案館收藏的《福建省反動會道門概況》中，對1950年春節發生於平潭縣的大刀會起事，有以下記載：

1950年2月17日平潭大暴動，即係王調勳、林蔭所策動。同年12月22日我護船部隊，在途中遭伏擊，犧牲部隊一名，民兵6名，傷4名，損失民船11艘，即係「福建人民反共突擊軍第七縱隊」副司令廖其祥結合刀匪楊道慶百餘人，所造成的罪惡。2月25日寧德暴動與11月11日的再次暴動，均由王琮指揮。據解放後至1951年6月的不完全統計，大刀會結合匪特煽動群眾，圍攻縣城，襲擊區鄉政府，伏擊搶劫，達17次之多，出動7,500多人，死傷我幹部群眾100多人，波及地區有邵武、南平、平潭、寧德、霞浦、福安、莆田、屏南等14個縣。其陰謀叛亂未成者有6次。¹

這一份全文65頁，由福建省公安廳政治保衛科於1951年10月編印的小冊子，介紹了省境內各縣市所查獲的「反動會道門」的狀況，推測應該是編印給地方幹部用以了解狀況用的資料。以篇幅而言，光是一貫道與同善社就佔了全書的34頁，可見共產新政權對這兩個救世團體的高度重視。²檔案內容中，可以清楚發現共產新政權直接把平潭大刀會事件視作閩北與閩東地區的反革命勢力

¹ 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安廳政治保衛科，《福建省反動會道門概況》（福州：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安廳政治保衛科印，1951），頁34，原件藏於福州市福建省檔案館。

² 關於近代中國「救世團體」（redemptive society）的研究，可參見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 103-122, 139-140, 154-162; Thomas David DuBois,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107-120;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p. 90-108; David Ownby,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Vincent Goossaert, Jan Kiely, and John Lagerwey edited,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1915* vol. 2 (Leiden: Brill, 2016), pp. 685-727. 又可參見王見川、康豹、宗樹人，〈導言：救世團體研究的回顧〉，《民俗曲藝》，172（臺北，2011.6），頁13-20。

對中共地方政權的挑戰，並認為這一系列暴動都與國民政府軍統人士的策動與指揮有因果關係。此一時間序列與因果關係的建立，與後續「反革命罪」與「反動會道門」兩個概念的建立，³是共產新政權對地方社會中早已存在的特定人群組織，一段非常嚴厲的政治指控。⁴但若跳開上文描述，回到地方社會發展的實際歷史脈絡去討論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即存在的大刀會組織與不同現代國家間的關係，⁵實則更加複雜。自1927年以來中共組織與當地的大刀會組織已有多次互動，可說對這群地方武裝勢力已有相當的了解。⁶1949年8月17日福州易幟後，對中共福州政權而言，除了

³ 參見：鄭永華、趙志，《近代以來的會道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秦寶琦、譚松林，《中國秘密社會》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949年後，對中國境內所謂反動會道門的史料討論，又可參見：趙嘉珠主編，《近代會道門史料集成：近百年來會道門的組織與分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福建部分參見：連立昌，《福建秘密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此外，曾任職公安部的陸仲偉，其著作也非常值得參考，參見：陸仲偉，《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⁴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新華時事叢刊：第87種·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洪長泰著，麥惠嫻譯，《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特別是本書第三章關於打擊民間流行教派的討論。

⁵ 大刀會與中共革命的關係，特別是在1927年以後，一直既合作又競爭。對中共地下黨而言，大刀會代表的地方勢力如同雙面刃，兩者間的和戰關係會隨著各地地方狀況不同，而出現巨大差異。毛澤東對大刀會的看法，參見：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8-9、11。閩東地區近日研究成果參見：許彬、陸發春，〈中共福建革命與大刀會組織研究（1931-1938）——以閩北和閩東為中心的考察〉，《蘇區研究》，2022：5（南昌，2022.9），頁51-63。目前所可搜集到對閩東大刀會的研究，多為當地學者的成果，參見王秀惠、潘榮陽，〈淺析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福建大刀會活動的社會功能〉，《龍岩學院學報》，25：4（龍岩，2007.8），頁56-58；林春蓉、潘榮陽，〈福建大刀會活動因素論〉，《黎明職業大學學報》，47（泉州，2005.6），頁77-80；繆慈潮，〈建國初期閩東取締大刀會情況概述〉，《黨史研究與教學》，97（福州，1991.3），頁36-39。

⁶ 閩北大刀會與紅軍之間的結盟關係，可參見范強、中共政和縣黨委史辦，〈閩北紅軍與建松政「大刀會」結盟的情況〉，收入吳其樂主編，《閩北黨史研究文論選》（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頁221-229；范強，〈略述政和縣大刀會勢力的崛起與衰亡〉，收入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政和縣文

來自蔣介石政權軍隊仍控制的沿海外島及臺灣本島的空襲外，⁷這群已然存在於地方社會中，且被定性為帶有宗教色彩的民間組織——同善社與大刀會——也被當局定位為重大威脅。這除了牽涉當時中共政權「反革命」政策的推展外，運用地方社會研究的觀點，我們必須指出自1950年以來，中共福建地方政權的組成並非以福建地區的幹部，而是以來自山西省的「南下幹部」為主力。⁸這群新來的外來權力新貴是如何看待當地的大刀會組織？凜於之前與地方武力組織周旋的艱苦經驗，累官至福建省副省長的南下幹部溫附山（1917-2001）⁹直指：「大刀會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迷信色彩的群眾武裝。閩侯地區各縣皆有大刀會組織」。¹⁰對發生在平潭的大刀會，溫說法如下：

〔1950〕2月17日（農曆正月初一）拂曉，大刀會頭目打著「向解放軍拜年」的名義，煽動會徒和不明事理的群眾近

史資料》第二輯（政和：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1982），頁70-79。

⁷ 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底止，福州地區的空襲與砲擊活動，參見：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一冊（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頁68-73。

⁸ 1949年後成為福建省政核心力量的南下幹部有極大比例來自山西。關於南下幹部進入福建的狀況，可參見郭天印，《長江支隊：1949年南下全景紀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吉朝陽、武忠明編，《陽城文史資料：第14輯·南征閩疆：長江支隊陽城南下福建幹部專輯（下）》（晉城：政協山西省陽城縣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2005）。關於南下幹部的研究，參見代雅潔，〈華北解放區南下幹部與南方新區鄉村土改研究（1948-1952）〉，《中國經濟史研究》，2019：2（北京，2019.4），頁177-192。

⁹ 溫附山為山西沁縣人，1949年春隨長江支隊南入福建，此後歷任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省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農工部第二部長、財貿部副部長、省政府秘書長、副省長、省委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溫附山，《往事千秋：溫附山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¹⁰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218。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閩縣、侯官縣合併為閩侯府；1913年3月，改為閩侯縣，縣治設於福州府內；1943年10月，國民政府將閩侯縣改名為林森縣；1946年元旦，福州市政府正式成立，縣市分治；1947年4月，林森縣為福建省直轄；1949年8月17日，林森縣解放，隸屬於福建省人民政府第四行政督察區；1950年4月，林森縣復稱閩侯縣，屬於閩侯專區。幾經變革，1973年7月，閩侯縣復劃隸福州市。上文的閩侯各縣，籠統而言，除了閩侯縣外，還包括連江縣、長樂市、福清市、永泰縣、閩清縣、羅源縣與平潭縣。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一冊，頁121-126。

千人，分三股包圍了守軍部隊在縣城、新澳、官井的駐地。他們身穿法衣，手持大刀、長矛，突然襲擊解放軍戰士。當發覺是大刀會暴動時，駐軍二五四團參謀長曹文章，當即組織機關人員和通訊連反擊，其他營地也同時與暴徒展開搏鬥。……這次平息大刀會暴動，擊斃會徒 80 多人，打傷 70 多人，拘捕 130 餘人。其中有 30 餘人是不明事理跟著來看熱鬧的群眾。解放軍戰士死傷者也達 50 多人。這是一個血的教訓。¹¹

然而，近千名手持冷兵器的大刀會徒與配備現代武器的解放軍之間的對峙，根本就是「兩個文明」間的對抗。¹²據當地說法，許多會徒是在「不明事理」的狀況下殞命：

是役我人民解放軍傷亡 49 名。大刀會徒死傷 123 人。僅韓厝寮一村當天就死 17 人。被騙參加暴動的死者家屬，只知自己的親人，吃完年飯出去，一夜未歸，卻不知被騙去送死。及至傳聞各地出事，才趕去尋找，認到親人，撫屍慟哭，悔恨不及。¹³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推測大刀會眾對中共新政權的反抗意識並不強烈，但中共外來的地方官員卻將此事形容為一個「血的教訓」，此間緣由為何？透過上文，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大刀會組織並不如國共武裝部隊宣稱般有強烈的殺傷力，兩造也都說明了大刀會徒多為「毫無軍事知識」的農民。因此，透過拉長歷史觀

¹¹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 220。

¹² 1950 年 2 月農曆春節的平潭大刀會事件，動員了一千多名平潭地區的大刀會徒突擊解放軍。這兩者間的對峙，幾乎完全複製了數月前發生在浙南平陽縣的靈溪刀匪事件。平陽大刀會事件研究可參見羅士傑，〈抗戰晚期的民變與地方社會：以平陽大刀會與同善社為討論中心〉，《漢學研究》，36：2（臺北，2018.6），頁 217-249；史料參見周干、王志斌，〈平陽大刀會始末〉，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第十輯（平陽：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頁 101。

¹³ 平潭政協文史組整理，〈大刀會暴動記〉，收入政協福建省平潭縣文史資料編輯組編，《平潭文史資料》第二輯（平潭：內部發行資料，1982），頁 78-85。

察的視野，且從福建地方歷史發展脈絡進行的討論，本文試圖揭示大刀會這類民間方武裝組織在近代福建地方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地方新政權為何宣稱這些能被輕易鎮壓的農民集體行動，與國民政府殘餘勢力的指揮有因果關係？其政策意圖與成效也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我們應該把大刀會組織及其起事視作為地方社會成員與不同時期福建地方政權間的政治互動，此一政治互動牽動與反映的權力結構變遷，如何以具體的歷史脈絡去梳理，而非重複延續過往上對下的政治獵巫？本文以「由下而上的歷史」觀點為核心，去檢視大刀會組織在閩北與閩東，從各自地方利益的捍衛者到成為反動會道門的發展過程；並理解不同時期福建地方政權與自民初以來流行於福建地方社會中的地方大眾組織，特別是「救世團體」（同善社與一貫道）與地方政治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將會論證大刀會組織並不是一個中央廚房式統由上而下發號施令的地方秘密社會組織。放到由下而上地方發展的脈絡可見，此一組織乃是二十世紀以來，福建當地百姓為了因應日常生活環境中惡化的治安與對秩序重建等問題，此一兼具民間信仰內容與地方兄弟組織傳統的大刀會組織乃成為閩北與閩東的普通百姓用來組織自己去與不同的權力者競爭的有效組織模式。本文也將呈現這一民間力量，如何一路從民間利益的捍衛者到逐步被民族國家所建構的妖魔形象吞噬，並提出相關的反思。

一、大刀會、民團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福建地方社會（1927-1937）

對閩北地區的百姓而言，大刀會是一種存在於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地方人群組織。以往許多研究秘密社會的學者將大刀會定位成帶有顛覆政權色彩的中央廚房式社會組織，從而出現許多溯源式研究。¹⁴但如下文所證，大刀會乃是在特定地方社會經濟條件

¹⁴ 代表性研究可參見秦寶琦，《清末民初秘密社會的蛻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下，才會出現的地方人群組織，且多半是以民間武裝組織的形式出現。以閩北大刀會而言，他們是二十世紀後，為了因應軍閥混戰滋生的散兵、餘匪問題所發展出的民間自保策略。除了民間自組的大刀會以外，這類以自衛功能為主所成立的地方武裝組織，在福建非常流行。根據 1929 年至 1931 年間對福建報紙登載內容的普查為例，福建乃是「民團」最發達的省份。全省 64 個縣中，52 個縣有民團組織：

民團是豪紳地主以及商人們所主辦的一種武裝組織。他們為要維持在農村裡所佔的絕對優勢的地位，不得不組成一種下層的軍事乃至政治的機構以保衛自己，榨取窮人。……這些民團往往採取很好聽的名稱，除簡稱為民團外，常有稱作「保衛團」、「保安隊」或「救鄉團」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無非是那些望族、紳董之類，防禦的對象不出土匪之類。¹⁵

福建地區民團運作的經費往往來自地方商人與地方稅額的供給。¹⁶ 福建全省民團成員總數約在四萬人以上，又因福建海外華僑眾多，進口武器較為方便，特別是閩南地區的民團還常配有精良的高殺傷力武器。同時福建正式軍隊人數不過五萬人左右，¹⁷可見民團是影響福建政局安定的力量。1920 年代以來，福建的民團勢力分別有位處東南部的張貞（1881-1963）與劉和鼎（1895-1969）、閩北的盧興邦（1880-1945），另外也有些較小股但對閩南地區造成重大危害的地方武裝勢力：陳國輝（1898-1932）、高為國（-1931）、汪漢民（1899-1933）等人。¹⁸民團一方面發揮地方自衛保安的功能，卻也

¹⁵ 劉一民，〈福建底民團與農村〉，收入李文海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社會組織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頁66-76。

¹⁶ 以商人為主要支持力量所成立的民團，也可稱為商團。商團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參見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朱英，《近代中國商會、行商及商團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¹⁷ 劉一民，〈福建底民團與農村〉，頁69。

¹⁸ 福建省政協、泉州市政協、漳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閩南民軍：福建民

以其武裝介入不同地方勢力間的械鬥，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威脅。¹⁹在政治立場的選擇，常可見到他們周遊於政見不同的地方實力者間，並以務實的實力主義形成足以影響大局的政治力量。

廣州開拔的國民革命軍進入福建後，造成了民團勢力的重組。原本主導福建政壇的福建軍務督辦周蔭人（1884-1956）²⁰瓦解後，周的殘部何金標（-1930）、劉宗彝、王岐山等人繼續在閩北活動。另股重要的民團勢力則為1926年至1931年間控制閩北的盧興邦。²¹周蔭人的殘部於1928年間加入盧部的運作。之後，盧興邦與周蔭人殘部與福建省警察大隊成為閩北地區的三股重要地方軍事勢力。除了軍人勢力外，閩北還有承襲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地方團練傳統的建屬六縣民團，團總為潘寶生。這些不同的地方武裝勢力爭奪的目標為政和縣城的控制權，因實力差異不大，因此出現「三月兩縣長、五月三頭戰」的權力格局。²²1930年8月，盧興邦被北伐軍劉和鼎（1895-1969）²³擊潰後退出閩北，潘寶生也遭到拘捕，周蔭人殘部劉宗彝與王岐山則併於劉和鼎部，並取得省政府警察大隊的名義繼續控制閩北的政和與建甌兩縣。劉宗彝等人

軍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¹⁹ 如陳國輝的屠村事件以及對華僑的騷擾，參見洪駿麟，〈陳國輝湖洋屠村梗概〉，收入福建省政協、泉州市政協、漳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閩南民軍：福建民軍史料編》，頁183-186；陳其揮，〈陳國輝屠劫永春鰲峰簡述〉，收入同書，頁187。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軍事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41。

²⁰ 周蔭人，直隸人，1908年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砲科第六期。1913年擔任北京政府陸軍部砲兵監。1923年隨孫傳芳進入福建，出任閩北護軍使。1925年擔任福建軍務督辦。1926年遭到北伐軍何應欽部擊敗，兵敗後下野並逃離福建。

²¹ 胡盛華，〈盧興邦傳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陳昌穎，〈盧興邦統治南平時期的文教事業〉，收入福建省南平政協文史組編，《南平文史資料》第三輯（南平：政協福建省南平市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82），頁50-51。

²² 范強，〈閩北紅軍與建松政大刀會結盟的情況〉，《政和革命鬥爭史話》（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13），頁188。

²³ 劉和鼎，安徽合肥人，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1929年率軍入閩參加剿共戰爭，1930年5月擊敗盧興邦部進犯，之後轉入江西。1935年，擔任駐閩第一區上將司令官。1946年擔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3月退役。1949年後來臺，任職於黨營裕台公司。1969年病逝臺中。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123）〉，《傳記文學》，64：4（臺北，1994.10），頁136-138。

的割據勢力，對當地造成了嚴重衝擊。當地農民為圖與之對抗，大刀會組織遂順勢出場：

在建〔甌〕松〔溪〕政〔和〕地區廣大農村出現了西路的黃祖會、黃帶會；東路的一心會、紅線會、大奶會等組織，他們統稱為大刀會。這以後，大刀會有組織的反抗活動，大煞了劉宗彝、王岐山一夥官兵的淫威。²⁴

可見，大刀會等組織乃是當地農民為了因應1930年代以來地方治安狀況惡化，因此結合清中葉以來「地方軍事化」所組成的地方團練組織傳統，²⁵加上民間既存之強調互助功能的大眾組織，²⁶展現出的實力亦足與現代軍事力量對抗。這也體現了十九世紀末以降各地團練組織的增能化的歷史過程。²⁷大刀會除了足以重挫劉、王等股軍事勢力外，也對同區域活動的中共福建紅軍造成很大的威脅：

打仗時，〔大刀〕會徒們身穿形形色色的法衣，手執刀矛，吞服硃砂，口念符咒：「土地公助陣前頭走，祖師老爺隨後跟，二十八宿從天降，阿彌陀佛護身邊。」衝啊，殺呀！不顧死活地進行集團衝鋒。這對力量尚弱又沒見過這種戰法的紅軍游擊隊威脅是很大的。²⁸

²⁴ 饒守坤，〈結盟〉，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編，《風展紅旗》第六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108。

²⁵ 類似狀況的討論，參見羅士傑，〈地方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所近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3），頁159-202。

²⁶ 18世紀以來地方兄弟組織在地方社會的研究，可見 David Ownby, *Brotherhood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莊吉發，《清代臺灣會黨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9）。

²⁷ 根據學者研究，十九世紀產生的團練組織，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時已經逐漸成為各地地方自治的基礎，從而出現許多增能與轉型，相關討論可參見梁勇針對清代巴縣檔案的研究，參見梁勇，《移民、國家與地方權勢：以清代巴縣為例》（北京：中華書局，2014）。

²⁸ 饒守坤，〈結盟〉，頁110-111。

1949年後擔任福建省長的葉飛（1914-1999）認為大刀會是一種「兇猛的密集衝刺」，²⁹這群未經現代軍事訓練與裝備的農民結合了信仰與精神動員的力量，達到了克敵的戰術效果。來自民間的武裝力量亦依恃對山區複雜地理環境的熟稔，多次對紅軍造成了致命的打擊，也曾動員群眾包圍政和縣周蔭人殘部的據點，並打死對方30多名官兵。為此，劉、王兩人多次帶兵下鄉，殺戮了數百名被認定為大刀會徒的村民。已如驚弓之鳥的他們，將鄉間身穿黃色衣服或腰纏黃帶的村民，一律以「會匪」為名處死。依恃西式武器的官兵與使用冷兵器之大刀會組織兩股勢力，在以山區為主的閩北呈現白熱化的競爭狀態，這對其他也遭受類似生活威脅的農民社區起了相當大的鼓舞作用。由農民組成的眾多大刀會組織已成為當地民團軍人的夢魘，並還發展成為與地方菁英合作的新興政治勢力。如政和縣的退休官員楊頌南（1884-1946）³⁰鑑於外地民團對政和縣區造成的騷擾，他於1930年底主動聯絡了鄰近三縣的大刀會組織，動員數千人攻入政和縣城，政和縣長周叔霖與王岐山等人被迫離開縣境，該縣隨後由地方菁英自行管理達七個月之久。自是，大刀會此一民間武裝組織讓地方社會得以有能力去對抗不同外來政權造成的生存威脅。同樣在福建省，相對富庶的閩南就沒有出現閩北般以農民為主體的大刀會起事，但卻更常見民團之間因勢力範圍的爭奪而爆發武力對抗。³¹可見大刀會組織發展的良窳是與當地的經濟、環境生態有直接的因果關係。³²

²⁹ 葉飛，《故鄉征戰紀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頁38-39。

³⁰ 楊頌南，1904年考取貢生。民國初年擔任江西省黎川、定南兩縣的縣長，從政25年，退休後回到故鄉政和縣的戶田村。除了聯繫大刀會外，1943年間，他也曾領銜抗議國民政府的拉伕政策。見吳世生，〈清名碩望的賢紳楊頌南〉，收入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政和縣文史資料》第四輯，（政和：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1994），頁55-56。

³¹ 何健魂、蔡爾輦，〈石獅土皇帝蔡持〉；張家瑜，〈陳佩玉其人其事〉，收入福建省政協、泉州市政協、漳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閩南民軍：福建民軍史料選編》，頁65-68、117-124。

³² 關於生態、經濟環境與農民抗爭的因果關係，參見Elizabeth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紅槍會的早期研究，參見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至是當地農民所主導的大刀會組織已成為閩北地區足以與民團勢力競爭的地方武裝團體了，除了捍衛各自的區域利益外，也或有呈現出「社會型盜匪」（social bandit）³³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也出現了對於此類民間武裝力量進行動員的想法。例如毛澤東即於1925年提出下述樂觀的看法：

為數不少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的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³⁴

毛對地方社會中秘密組織的樂觀評估，與之前活躍於辛亥革命陶成章（1878-1912）的看法非常接近。他們都對既存於民間的人群組織之激進化與革命化有相當高且樂觀的期望。兩人都以啟蒙者自居，相信透過他們的「引導」，就能讓這些既存的地方武裝團體轉變成自身黨派的支持力量。³⁵但他們往往忽視了這些地方武裝背後的地方權力體系及資源競爭關係，並過度地強調了他們的革命意志在地方集體事件中所能發揮的力量。大刀會等地方武力組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³³ 關於「社會型盜匪」（social bandit）的討論，參見Eric Hobsbawm著，鄭明萱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臺北：麥田出版事業公司，1998）；Eric Hobsbawm著，楊德睿譯，《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臺北：麥田出版事業公司，1999）。

³⁴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頁8-9。

³⁵ 陶成章對地方會黨的看法，參見陶成章，〈浙案記略〉，收入湯志鈞編，《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32-342；孫江，《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臺北：博揚文化出版公司，2016）。類似地方秘密社會激進化與參與革命的討論，參見周建超，《秘密社會與中國民主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三谷孝著，李恩民等譯，《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織並不是為了推動二十世紀以降的政治革命而出現，也顯然跟宏大革命敘述缺乏因果連結。³⁶陶與毛的理想都未實現，但他們眼中落後與迷信的地方團體，卻成為他們推動革命事業最大的地方阻礙之一。³⁷回到地方發展脈絡，中共在閩北的發展狀況又為何？這可透過1932年2月26日閩北紅軍的〈反大刀會宣傳大綱〉，探知他們的看法：

大刀會本來就是紅槍會，發生在北方河南等地，河南紅槍失敗以後，……就跑來福建，因為它是利用迷信來欺騙人的，因為它是利用迷信來欺騙人的，在文化不落後的地方就沒有人會相信，故它找到文化比較落後的閩北來。³⁸

從上文可見，閩北紅軍認為大刀會的組織性的影響力是立基於當地的文化落後，而不是因為當時嚴重的兵匪治安與資源競爭問題。諷刺的是，他們眼中的文化落後與迷信的農民組織，卻於1931年至1935年間多次成功地造成蘇區與紅軍部隊的大規模傷亡：

1931年，松溪周墩反動民團團總張楓亭從建甌川石請來兩個大刀會師傅，組織起登山大刀會，率先揮舞反革命刀，……。1934年11月初，建松政浦邊界縣委派往崇安蘇

³⁶ 並因此出現 James Scott 所言的「國家視角」盲點，體現革命成功後出現的歷史書寫，往往會被片面改寫並簡單化。相關討論參見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9.

³⁷ 關於中共早期在地方的發展與地方武裝組織關係的討論，毛於1930年帶領紅軍在閩西地區活動，對於當地的地方武裝勢力以「流氓問題」視之。參見：毛澤東，〈流氓問題：紅四軍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案〉（1930年6月），收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補卷》第三卷（東京：蒼蒼社，1984），頁135-139。關於閩西的地方勢力與中共紅軍勢力互動與競爭的討論，參見：陳耀煌，〈民國時期的農村社會與地方強人：傅柏翠與閩西地區〉，《東吳歷史學報》，29（2013.6），頁59-114。

³⁸ 閩北分蘇人民文化委員會印，〈反大刀會宣傳大綱〉（1932年2月26日），收入中共福建省建陽地委黨史辦、福建省建陽地區檔案館編，《閩北黨史文獻》第二集（南平：中共福建省建陽地委黨史辦，1984），頁141。

區的參觀團120多人，被建松政浦邊界2,000多名大刀會徒所包圍，……。11月中旬，大刀會徒1,000多人在劉和鼎部的糾合下，分三路進剿建松政蘇區，慘殺了300多名黨員幹部和革命群眾。接著又慘殺了在七井潭的建松政紅軍醫院治病的28名傷病員和醫生、護士。1935年初，大刀會又一次向蘇區進攻，建松政中心縣委書記洪坤等人在反擊戰中不幸犧牲，……。由此可見，如何消除大刀會的威脅，已成為紅軍和新生的紅色政權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³⁹

對閩北農民而言，紅軍與之前的兵匪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如前文所述，大刀會組織並不是一個中央廚房式的反政府組織，但更接近是地方人群用來組織與訓練社區成員進行武力對抗之可靠並有效的組織邏輯。這可從當地民團也會雇用大刀會的法師來訓練成員中看出。自命為啟蒙者的職業革命家不是救世主，他們自言的革命力量也無法將他們眼中的地方落後勢力轉向革命，結果往往空留情緒性話語，並出現將大刀會與不久前北方的義和團並置的評論：

大刀會是打得死的，如認真打不死，那末清末的義和團，最近幾年河南的紅槍會，也就不會失敗了。……天下如果認真有打不死的人，他也就不會躲在山裡來教徒弟，他可以進一著把這些徒弟帶到南京去坐天下。現在他們不敢到城市去，不敢出頭露面，就是他們自己明白。這種辦法只能騙騙鄉下人，不能見真場面的證據。⁴⁰

然而實際的狀況是，閩北不同區域的大刀會組織的領導階層靈活地運用對閩北山區地理環境的熟稔，並積極地配合蔣介石政權派駐在閩北的劉和鼎部的剿匪任務，⁴¹多次對紅軍與蘇區發動攻擊。

³⁹ 饒守坤，〈結盟〉，頁109-111。

⁴⁰ 閩北分蘇人民文化委員會印，〈反大刀會宣傳大綱〉（1932年2月26日），頁141。

⁴¹ 張從典，〈劉和鼎部隊駐閩情況概述〉，收入中國人民政協福建省建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建甌文史資料》第一輯（建甌：內部發行資料，1980），頁

簡單地說，閩北大刀會已經變成了蔣介石政權的「剿匪義民」。⁴²這也是常見於中共黨史中對大刀會組織的批評：他們認為大刀會徒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因此容易出現被當下生存相關的利益收買與裹挾的現象。⁴³但是若從地方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思考，閩北大刀會的政治信仰，又何嘗不是他們試圖以自身能擁有的資源，去最優化他們與不同現代國家政權間的博弈互動關係。⁴⁴

1934年1月閩變結束後，福建進入浙江人陳儀（1883-1950）主政的階段，1934年10月江西蘇區紅軍開始長征，這代表了閩北紅軍與國民黨等股勢力在當地的消長。選擇留在閩北的紅軍躲入深山活動，並不時遭遇來自小股民團與大刀會的襲擊。為了能繼續生存下去，1935年起，紅軍以結盟為名，將其勢力併入林熙明（又名林乃導）⁴⁵的大刀會組織中：

林熙明與紅軍結盟後，嚇得湯德崇等土匪退避三舍，國民黨軍隊、土匪也不敢輕易對他動兵，……。為了表示結盟

37-46。

⁴² 關於義民問題的討論，目前多見於清代臺灣，且多針對特定的義民廟宇。對清帝國時期義民的討論可參見丁光玲，《清代臺灣義民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Jonatha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edited,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特別是導論與第二章。過往對民間武裝對峙（械鬥）的研究，往往強調「族群分類」造成的影響，但早在1990年代，學者即對此說提出質疑，參見Stevan Harrell, "From Xiedou to Yijun, the decline of Ethnicity in Northern Taiwan, 1885-1895,"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June, 1990), pp. 99-127; David Ownby, "The Ethnic feud in Qing Taiwan: What is this violence business, anyw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782 Zhang-Quan Xiedou,"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June, 1990), pp. 75-98.

⁴³ 此一觀察新近的成果參見池龍威，〈福鼎大刀會研究（1937-1953）〉（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21），特別是第五章的討論。

⁴⁴ 此處想法得自宋怡明的「優化處境策略」（strategies of optimization）概念，參見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鐘逸明譯，《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頁336-337。

⁴⁵ 根據相關人物回憶，林熙明曾在閩北地區稱帝，並建設有皇宮等建築，其最終於1939年9月間被押往永安，遭省保安處未經審判後處決。婁啟鈞，〈閩北大刀會匪林乃導被捕前後追記〉，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二卷·社會民情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461-462。

的忠心，他[林熙明]特地在「順天救民軍」旗上增添「抗日救國」四個大字，……。⁴⁶

換句話說，與五年前相比，對閩北地區的農民而言，周蔭人殘部所引起的治安不靖問題已獲得解決。農民所組成的大刀會地方武裝與蔣介石政權建成了同盟關係，從而摧毀了中共組織在當地發展的可能機遇。1935 年以後的新問題：首先為陳儀省府持續向基層推進的政權建設，並與地方勢力的衝突。復次則為逐漸進逼的日本侵略力量。下文要接續討論的問題是：若從地方社會的角度去進行觀察，地方社會中的不同人群又會如何去進行應對？透過下文對中日戰爭時期活躍於閩東海岸的偽軍組織的討論，將會去進一步澄清如閩北大刀會這樣的民間武裝及其組織模式又會如何拓展到沿海的閩東地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刀會組織也同時發生了轉型。

二、戰時的大刀會組織、海上偽軍與閩東地方社會 (1931-1945)

1934 年滿洲國成立後，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非正式殖民帝國」的建立已取得相當進展。⁴⁷1937 年開始的第二次中日戰爭，⁴⁸日方一連串的擴張行為，亦引發中方不同階層與人群的激烈反應。但關於戰爭對百姓日常生活秩序之影響的議題，以及人民

⁴⁶ 饒守坤，〈結盟〉，頁115。

⁴⁷ 日本非正式殖民帝國概念參見加藤陽子著，黃美蓉譯，《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新北：廣場出版，2016）；加藤陽子著，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ited,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關於日本的和戰選擇，加藤陽子的討論尤其值得注意，參見加藤陽子著，黃美蓉譯，《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新北：遠足文化，2016）；同氏著，賀申杰譯，《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與軍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

⁴⁸ Rana Mitter 著，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揭開你所不知道的八年抗戰》（臺北：天下文化，2021）；齊錫生則運用日記資料討論抗戰亦相當值得參考：參見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1937-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

應對方式的變遷，則顯然不是放置在強調民族主義的對抗性視野中就可看清。⁴⁹上節討論閩北百姓如何運用大刀會的組織去應對民團與紅軍的治安問題，本節則要闡述大刀會組織模式於1939年後發展的亮點——從閩北山區轉向閩東沿海的數個小島。接下來要釐清的是：該組織發展對海上人群營生模式變遷的影響，及其與閩東沿海小島及陸上關係的聯繫。⁵⁰1900-1949年間，除了福州與廈門曾被日本軍隊短暫控制外，其餘縣市仍在蔣介石政權的管治下，1941年日軍宣布封鎖中國海岸線後，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學者所稱的戰時畸形繁榮的現象。⁵¹對此一發展，我們應該結合明清以來當地昌盛的海商傳統背景進行處境如何優化的討論，⁵²而不是以堅壁清

⁴⁹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著，何啟仁譯，《戰火中國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暴與崛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此書著重公務人員經驗，在戰爭對基層社會生活影響之面向上未展開足夠討論。

⁵⁰ 關於東南沿海地區水上人群（包括蜆民、船民）的集體研究成果，參見David Faure and Xi He edited, *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廈門大學歷史系黃向春亦長年投入福州地區蜆民研究，參見黃向春，〈清代福州的「蜆民」與地方社會：以一通嘉慶碑銘為中心的歷史「厚描」〉，《學術月刊》，51：8（上海，2019.8），頁168-178；〈身份、秩序與國家：20世紀50年代閩江下游地區的「水上人」與國家建構〉，《開放時代》，2019：6（廣州，2019.12），頁182-200。廈門大學的傅衣凌教授很早就注意到水上人在明代歷史中的重要性，參見傅衣凌，〈《王陽明集》中江西的「九姓漁戶」（休休室讀史札記之一）——附論江西九姓漁戶與宸濠之亂的關係〉，《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1（廈門，1963.3），頁63-68。關於水上人群的重要研究又可參見佐藤仁史，〈近代江南の漁民と天主教〉，《歷史評論》，765（東京，2014.1），頁37-46；朱海濱，〈九姓漁民來源探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1：2（西安，2006.4），頁51-59。關於溫州蜆民的研究可參見林亦修，《溫州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謝湜近年對明清以來浙江沿海的海島社會討論，也非常值得參考，參見謝湜，《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歷史和海島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臺灣關於水上人的專門著作並不多，且多半將其族群化處理，不過針對漁民社區的研究則不少，參見王崧興，《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

⁵¹ 馮筱才，〈「戰時繁榮」：1937-1945年溫州的經濟貿易及其統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R. Keith Schoppa,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⁵² 村上衛結合中英雙方的檔案資料，以廈門為中心，進行鴉片戰爭前東南沿海地區的社會史討論，已多觸及當時地下貿易網絡的狀況。村上衛著，王詩倫譯，《海

野的敵我之見看待這些東亞海域港市與島嶼在戰時發揮的歷史作用。⁵³

對戰時福建地方社會成員而言，並非只有外國的侵略者對其生活造成威脅，國民政府的地方官僚體系對地方資源的過度汲取往往造成更大的傷害。⁵⁴因蔣介石福建政權「基層施政粗暴化」的激化與國際局勢的轉變，⁵⁵大刀會組織因此從閩北山區擴大發展到閩東沿海各縣以及外海島嶼。如 1943 年閩東地區就爆發對抗政府強硬徵兵的大刀會事件，以下見戴玄之（1922-1990）對閩東大刀會起事的討論：

民國32年（1943）春，福建省寧德、羅源、福安、福鼎、霞浦一帶，紅槍會（亦稱大刀會）極為盛行，鄉民為了躲避兵役，紛紛參加紅槍會反抗徵兵，……紅槍會員皆當地鄉民，……一隊數百人，由其首領祖師爺傳帖招集。祖師請神作法，會員吃符念咒，手持紅纓槍，一路縱隊前進。為首者執七星旗，作規律左右搖擺狀，會員亦如之。有一祖師著紅色僧服，……右手執號角（海螺）作為指揮號令，會員隨聲勇猛前進。國軍的士兵，也多鄉民迷信，在緊張

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日本學界近年來的海洋史研究成果，參見上田信著，葉韋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更重要的是，Eric Tagliacozzo、蕭鳳霞與 Peter C. Perdue 針對 19 世紀中以後「亞洲地中海」發展所編著的 *Asia Inside Out* 三部曲，則充分反映出最近二十年亞洲海域史的最新成果。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and Peter C. Perdue edited, *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Asia Inside Out: Itinerant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⁵³ 關於島嶼地區研究之方法論，參見濱下武志著，李侑儒等譯，《海的亞細亞：濱下武志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新北：大家出版，2023），頁 96-102。

⁵⁴ 鄰近的浙南沿海地區於 1944 年因徵兵激起大刀會與同善社主導的民變。關於抗戰時期強硬徵兵引起民變問題的討論，可參見羅士傑，〈抗戰晚期的民變與地方社會〉，頁 217-249。

⁵⁵ 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1937-1945》，特別是第八章的內容。

驚慌中，射擊不準，亦增加其迷信的心理。國軍幹部，深知其偽，但士兵幼稚，乃改變戰術，進而採取「攻心戰術」，以迷信破迷信的辦法，用以提高士氣；於是殺狗取血，塗於子彈，刺刀、槍口、手榴彈、砲彈等各種兵器的尖端。同時告誡部下，謂紅槍會的法術為污物所破，符咒不靈，可以一舉而殲之。士兵信以為真，士氣大振，在大刀會員方面聞之也認為污物破其神術，自信心瓦解，不到兩月，紅槍會（大刀會）被消滅。⁵⁶

戴將閩東大刀會與華北紅槍會直接進行連結的作法雖有待商榷，但1943年間，大刀會已成為浙南與閩東地區百姓用以組織自己去進行「躲避兵役」與「反抗徵兵」的人群組織。綜合前文討論的1930年代閩北大刀會、1943年閩東大刀會、1944年浙南平陽縣與1950年平潭大刀會事件，可以發現大刀會是一個持續相當有效的地方武裝組織。但在戰鬥技術的發展上，大刀會則沒有突破性的改善。大刀會的行進，與其說是軍事行動，更像是地方邊境遊神活動的陣頭。1943年春大刀會於閩東流行所代表的是：強硬的徵兵徵糧政策已經造成青壯年的不滿。曾在1920-1930年代成功對抗閩北兵匪的大刀會組織模式，1940年代又成為地方社會應對基層政權行政粗暴化問題的有效回應方式。

大刀會組織由閩北拓往閩東各縣並跨入沿海，此間親附日本偽軍的加入⁵⁷，則讓該人群組織發展面臨新的挑戰與轉型的機會。1939年福建省主席陳儀省府內遷至閩西永安，等同放棄對沿海地帶的經略。至是閩東海上生態丕變，依附日本帝國的「偽軍」更踴躍地加入此區的資源與權力競逐。福建沿海局勢的變化，如下文所示：

⁵⁶ 戴玄之，《紅槍會（1916-1949）》（臺北：食貨出版社，1973），頁209。關於1943年閩東大刀會的記載，參見申仲銘編著，《中華民國資料叢稿（增刊）：民國會門武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68-69、181。

⁵⁷ 劉鳳翰，〈日軍侵華期間偽軍的興起與蛻變〉，《國史館館刊》，18（臺北，1995.6），頁211-213。

1937年10月24日，日寇在金門島登陸，金門縣長鄭漢望風而逃（隔年在漳州被捕後槍決）。翌年5月14日復在廈門登陸，廈門駐軍第七十五師不戰而退。此後，日寇以少數兵力扼守金、廈，……福建沿海各島嶼便形成一個特殊地帶，……當時盤據各島嶼的土匪有崙山的蔡功、南竿塘之王福明與林義和、小麥之翁尚功和莊大志、白犬之余阿煌和林震等，均先後為日寇所利用，委以福建和平救國軍名義。⁵⁸

這些位處「特殊地帶」的島嶼面積皆不大，有限的自然資源也無法給養更大規模的武裝部隊。以該區域最強盛的張逸舟（1905-1951?）而言，最巔峰時也大約為3,000人的規模。⁵⁹這些島嶼的武裝勢力——如福鼎縣外海的崙山島——也會聘請大刀會法師來協助島上部隊的訓練工作。⁶⁰當時日軍還派員前往溫州外海的北關島，參觀島上的大刀會的「開堂試刀」。日軍對大刀會展現出的戰力大感驚奇，還傳說贈送步槍給島上的大刀會眾。⁶¹島上人群也常具有跨國背景，如蔡功為臺灣人，他所組成的部隊又稱為「烏軍」，主要根據地為崙山島，⁶²翁尚功則出身福清，⁶³他從小隨父

⁵⁸ 薛駿駒，〈福建和平救國軍內幕〉，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二輯（福建：福州人民出版社，1963），頁117。

⁵⁹ 此區的海上勢力至少可追溯到南宋末年。根據學者的看法，十六世紀末以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已經出現多群憑藉國際海上貿易崛起的「邊境新興勢力」，參見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2005：2（北京，2005.5），頁81-92；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本文討論海域的最大勢力是17世紀時鄭成功的海上傭兵集團，相關研究參見：鄭維中（Cheng Weichung）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新北：衛城出版，2021）。

⁶⁰ 關於福鼎與崙山島的大刀會活動，參見林守無主編，《福鼎縣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3），頁22-23。

⁶¹ 政協浙江省蒼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第七輯·大刀會始末》（蒼南：編者印行，1992），頁22-23。

⁶² 關於蔡功與烏軍，參見林守無主編，《福鼎縣志》，頁640-641。

⁶³ 翁尚功，福清縣高山人，幼時居住日本，並接受日本教育。1932年投考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幹部學校第三期，但並未畢業。後續前往日本學習航空，回國後加入國府航空委員會，並先後擔任分隊長、大隊長等職。後因傷離開國府軍隊。1939

母於東京經商，日文為其母語。他先於1932年返回中國從軍，後因傷離開軍隊。1939年，他轉投南京汪精衛政權，隨後返回福清建立日式裝備的華南綏靖軍。⁶⁴這群海上勢力，過往常用「土匪」或「海匪」稱之，⁶⁵但這群所謂的海匪／偽軍除了結合在地武裝組織大刀會傳統外，他們也獲取日本的裝備支持，可說他們並不是所謂的「土匪」，而是一支具有跨國現代性的地方武裝組織。

隨著陳儀省府內遷，這些離岸並不是太遠的島嶼形成一個利於這些海上武裝力量存在的特殊地帶。中日開戰後，日軍在福建以執行「建軍」為名，積極地去收攏這些地方武裝力量以為己用。與其他偽軍相比，福建的兩股偽軍皆是來自海上的游擊力量。日本帝國收編福建沿海的海上人群後，將其歸在「福建和平救國軍」的番號，並先後建立三個集團軍組織：白犬島余阿皇的第一集團軍、張逸舟的第二集團軍、蔡功的第三集團軍。這三股力量中，又以張逸舟最引人關注。張出身福建仙遊縣，⁶⁶早年曾擔

年，翁回到故鄉加入汪精衛政權的「和平救國軍」並歸併入張逸舟部。1945年8月，翁以「南竿先遣軍」的番號進駐南竿。王調勳前往策反翁部，但翁害怕遭到軍統以漢奸制裁，因此暗夜潛赴東引後，再轉往臺灣。1949年3月，翁尚功被臺灣高等法院以漢奸罪判處死刑。參見劉家國等編，《連江縣志》，〈兵事志〉，「第二篇第三章：復員與綏靖時期」，〈<http://gov.matsu.idv.tw/lienchiang/military.html>〉，（2024/2/28）。

⁶⁴ 原壽梓，〈軍事委員會南竿先遣軍概況〉，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四卷·政治軍事編》第四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111-112。

⁶⁵ 此類刻板印象，許多來自當時外國人的遭遇及報導，參見：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徐有威、貝思飛主編，《洋票與綁匪：外國人眼中的民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對於民國時期土匪的整理，參見劉革學編著，《中國土匪大結局：第一部中國近代土匪活動野史》（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

⁶⁶ 張逸舟1939年下海後的主要根據地為南日島與湄洲島，同年起擔任福建省和平救國軍第二集團軍司令，將控制的領域逐漸擴大到平潭島與白犬島，並在日人的協助下，逐漸控制沿海貿易通道，形成海上重要勢力。張後續被軍統閩北站吸收，並協助國民政府購買軍用物資。1945年5月，正式歸順國府，1949年後先逃往香港後轉到臺灣，1951年被控共謀罪逮捕並送管訓，1953年2月獲釋。見劉家國等編，《連江縣志》，〈兵事志〉，「第二篇第二章：抗日時期」，〈<http://gov.matsu.idv.tw/lienchiang/military.html>〉，（2024/2/28）。

任仙遊縣自衛隊隊長，曾赴日遊歷、並結識閩南民團的重要領袖張雄南（1897-1939），之後成為其附屬勢力。⁶⁷張雄南部於1939年遭陳儀省府剿滅後，張逸舟等人率領殘部突破福建省保安團的圍堵，於1939年8月率部下海。他們先佔據興化灣的湄洲島，之後控制南日島。為求自保與報復心切的張逸舟迅速地與廈門的日軍部隊取得聯繫。他與日軍合作逐步控制閩東沿海的航線，⁶⁸他們並非以海洋水產資源維生，而是是依恃航線上運行資源的控制：

設立稅局關卡，勒徵漁民的漁稅，船戶交通船隻的保護費和商人進出口的貨物稅；組織商業機構：新華公司，利用其交通工具大小輪船、汽船前往廈門、上海、沈家門各埠，搶購大批物資，榨取高額利潤。⁶⁹

透過「做餉」（控制航路，並向過路商船收取費用）的生計模式，再加上多次劫掠外國商船，這一群接受過大刀會組織影響的海匪／偽軍結合日本帝國在當地勢力的經略，⁷⁰配合日方護衛香港到上海的航路安全，⁷¹從而積聚大量的過路財。此區除了仍由陳儀省府控制的平潭島外，閩江口與福建沿海的重要航路上的南竿塘島（今連江縣南竿鄉）與白犬島（今連江縣莒光鄉）則分別由林義和（1909-1941）⁷²與張逸舟等人先後控制。

⁶⁷ 參見：阿明，〈剿滅閩中張雄南匪幫始末〉，《湖北檔案》，2007：3（武漢，2007.3），頁44-46。

⁶⁸ 張馳，〈福建和平救國軍張逸舟部瑣聞〉，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四卷·政治軍事編》第四冊，頁65-67。

⁶⁹ 張馳，〈軍統閩海軍運直屬組〉，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四卷·政治軍事編》第四冊，頁45。

⁷⁰ 日人在本區經略的討論，參見李恩涵，〈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臺北，1999.6），頁133-165。

⁷¹ 關於海運航線的討論，參見李宇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日海運在亞洲國際海域的競爭（1936-193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3（臺北，2011.9），頁53-97。

⁷² 林義和，福建省連江縣南竿塘人，初以近海漁業維生，後掌握機緣經營海商業。隨著林與其他同時代海商集團競爭的白熱化，林也組成了自有海外武裝勢力。1939年，擔任汪精衛政權下「福建和平救國軍」第二集團軍第一路軍司令，基地為白犬島。1940年後，林部逐漸成長到有三千人之譜，並與已經跟軍統合作的張逸舟形

因中日戰爭的影響，下海到閩東沿海的島嶼成為這些福建地區的前民團成員一個開拓藍海的機會。自從金門、廈門及其周邊海域成為日軍控制的區域後，平潭島躍升為福建沿海的重要戰場。為求建功，張逸舟等人多次協同日軍對國民政府的武裝力量發動作戰。從1939年7月起至1941年9月兩年多的時間，不同陣營的和平救國軍，曾六度在日本海空軍的掩護下對平潭進行登陸戰，還試圖建立政權。⁷³選擇攻擊平潭，除了是日方軍令外，另一個原因則是張等人窺知平潭守軍人數不足的現實。張逸舟雖曾短暫地控制過平潭縣城數月，但皆為平潭縣長羅仲若（1904-1967）⁷⁴擊退。羅仲若於1941年12月調任鄰近的福清縣後，出身平潭的原軍事科長林蔭（1908-1979）⁷⁵，作為接任者亦結合當地民團立下多

成對峙局面。隨著中日戰事逐漸變化，1941年8月初，林義和開始探詢投靠中華民國政府的可能，但因消息走漏，引起日本興亞院廈門聯絡處的不滿。林後來落入張逸舟之手，遭投海謀害，年僅34歲。林義和娶有四妻，與第二任妻子生有一女，外孫女婿曹爾忠曾任連江縣立委。參見劉家國等編，《連江縣志》，〈<http://gov.matsu.idv.tw/lienchiang/character.html>〉，（2024/3/1）。

⁷³ 平潭六次戰役的詳細過程，參見黎昕、徐曉望編，《平潭歷史文化概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頁84-87；鄭添恩，〈抗戰期間海匪六次血洗平潭島〉，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福州：福州市政協，1992），頁163-170。

⁷⁴ 羅仲若，福建連城縣莒溪鄉人，1925年連城縣立中學畢業後，在鄉村小學任教數年。北伐戰爭後，羅加入國民政府，歷任漳州、龍溪、晉江等地區長。1939年7月，福建省府派任羅為平潭縣長，任內組織地方民軍與日軍、偽軍多有周旋。1941年7月調任福清縣縣長，1943年奉調同安縣長，1945年應陳儀邀請赴臺任職臺灣長官公署民政處，1947年，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調任為民政廳長。1951年5月以後，先後在臺灣省政府建設委員會，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任職。1958年8月，則調任為嘉義縣長。1976年秋病逝臺灣。〈羅仲若〉，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系列二十），數位典藏號：129-200000-3801。國家檔案館亦藏有羅氏的平潭縣長任官資料。福建省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潭縣志》，卷36，〈人物〉（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頁718-719。

⁷⁵ 林蔭於1941年12月至1947年7月擔任平潭縣長，任職期間數度率平潭縣自衛隊攻擊日本軍艦。當時平潭島民對抗日本軍隊的過程可參見徐興祖等，〈憶閩中沿海突擊隊〉，收入政協福建省平潭縣文史資料編輯組編，《平潭文史資料》第二輯，頁1-7。林蔭於1947年被選為平潭縣的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平潭解放後，林蔭退駐馬祖，並擔任情報局馬祖第二工作站少將站長，1963年退役，1979年病逝於臺北。參見福建省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潭縣志》，卷20，〈人大、政府、政協〉，頁445；卷36，〈人物〉，頁730。

次戰功：

1939年日偽進犯平潭，他奉命協助平潭縣長羅仲若抗日。從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他前後三次親自參加光復平潭的戰鬥。1941年接任平潭縣軍事科長。同年11月擢升平潭縣長。……分別於1943年10月7日、1944年12月31日、1945年2月5日、1945年3月12日俘獲日軍「多多丸」、「紀寶丸」、「勝浦丸」、「大興丸」好等六艘日軍運輸艦，襲擊被日軍侵佔的牛山島，奪回導航燈塔，並在流水東尾村發動圍殲日軍的戰役。……以斐然戰績榮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的華胄勳章，國府主席林森也贈送海城維翰匾額。⁷⁶

透過上文描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林蔭以及平潭縣地方武裝組織自衛隊發揮的戰力。林蔭與海上偽軍集團共同的營生方式，除了與海洋相關的漁鹽資源外，主要也是經營武裝海上貿易與走私。⁷⁷

1940年代這一群位處邊緣島嶼地帶的海上武裝勢力，因著交戰國間顧此失彼的難免狀況，因此得以有機會得以周旋在重慶、南京、東京與華盛頓不同民族國家的政權間。他們雖處於大陸的邊緣地區，但他們在海上的存在也並不光是因為畏懼兵役與反對政府施政而已，而是他們找到一種他們覺得那個時代，更加適合當地環境之「優化」生活與營生的方式。⁷⁸他們雖也接受過大刀會

⁷⁶ 平潭縣比干文化研究會編，《平潭林氏通鑒》（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頁215。關於三軍通用的華胄勳章，參見《軍事委員會公布華胄榮譽獎章給予辦法訓令》（1938年4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訓令銓（三）漢字第3690号。

⁷⁷ 蕭邦齊（Keith Schoppa）針對抗戰時期浙江的研究，也指出溫州在當時已經成為重要的走私口岸，甚至還有「小上海」的稱號。廈門大學的連心豪也注意到臺灣海峽的「水客走私」的現象，其後續專書與Philip Thai之研究強調近代中國官方打擊走私的歷史過程。日人奧野修司與松田良孝也針對沖繩海域的走私貿易與人口流轉過程進行研究。東南沿海整體環境史的研究，可參見穆盛博（Micah Muscolino）的東南沿海漁業環境史疏理。參見松田良孝著，蘆荻譯，《被國界撕裂的人們：與那國·臺灣往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⁷⁸ 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言：歷史沒有製造道德主題，也不製造道德知識。

組織模式的影響，到了1940年代後，由海上人群所建立的民間武裝組織又搖身一變成為「偽軍」與所謂的「海匪」。但值得特別點出的時代變遷是，包括林義和與張逸舟等人，他們都曾先後在南竿塘（今連江縣南竿鄉）建立各式現代化建設——包括建立發電廠、架設電燈，漁獲的罐頭工廠。甚至建有「新華貿易公司」，分別在廈門、上海與浙江省的沈家門地建立分公司，專事與臺灣、中國、日本與香港等地的海上貿易相關事務。他們還擁有自己的船隊，1942年張逸舟就是搭乘該公司自有的輪船前往南京面見汪精衛。⁷⁹換句話說，相對於立基於閩北山區農民大刀會武裝，此一立基於海上的民間武裝組織甚至還提供了一個地方版的現代化藍圖及願景。不論如何，戰時這些明顯與資本運作相關的發展變化是非常值得另文展開更細緻的研究。⁸⁰

三、南下幹部與1950年平潭大刀會起事

1945年夏末抗戰結束後，福建海上勢力因先前與重慶政權

歷史學者的工作不在責備過去歷史的行為者，或是指責現今的讀者。他們的責任是調查所研究的地方和時期出現的道德主題的是什麼規範和條件。追問為什麼有些中國人選擇和日本人合作，當然有它的效用，但是或許更重要的是問：為什麼當時有人覺得和日本人合作是對的。卜正民著，林添貴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5），頁304-305。

⁷⁹ 薛俊駒，〈福建和平救國軍內幕〉，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二輯，頁117-129。

⁸⁰ 限於本文題旨為大刀會歷史過程之討論，冷戰前後東南沿海海上人群的活動，本人將另文進行處理，預計討論抗戰時期經濟作戰（搶運與統制經濟）對該區域地方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地方社會成員的不同應對。將以前福建省國大代表、軍統地方要員江秀清生涯為主要切入點。江秀清（1900-1992）畢業於中央警官學校高級班，並赴日本內務省警察大學深造。曾擔任福建省福州市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歷任中國國民黨福州市黨部執行委員、福建省政府農工廳第四科科长、駐閩綏靖公署第二科科长、財政部福建省緝私處處長、福建省貨運管理處處長。參見國民大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臺北：國民大會秘書處，1978），頁279。江於國民政府遷臺後，先攜同家人避住香港，後又返臺擔任國民大會代表。其在香港與臺灣兩地的生活，及日後旅居澳洲、最後病逝臺北的相關紀錄，可參見其女江靜枝的回憶錄。江靜枝，《夢裡早知身是客》（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特別是軍統局）建立了合作關係，⁸¹因此躲過了戰後的責任清算。⁸²但福建省政府公安廳於 1951 年刊行反動會道門的調查報告直指：「保密局福建站站長王調勳（1912-1989），係多年同善社友，1950 年 3 月閩東刀會總管王琮從外地回閩隨即到海島與王匪聯絡，並與閩浙刀會頭子朱銳（?-1950）等合謀組織匪『中華救國保民軍』。」⁸³認定這一批人就是 1950 年初在平潭發動大刀會起事的幕後黑手。但為何大刀會組織會成為中共新政權下的「反動會道門」組織？地方文獻也直指大刀會為「蔣幫匪特的地下武裝」？⁸⁴這等於是把中共建政之初最忌諱的蔣介石政權殘餘與宗教迷信兩個元素，同時匯入對具長遠地方源流之民間武裝組織的定性描述。此一官方報告中的線性敘述，年代與邏輯條理也都格外清楚：

1944 年福安縣大刀會起事，會首陳友昌逃至平潭，與林超凡聯繫。確定甲亭安村之先覺總祠和君山頂國清院為活動地點。開始發展大刀會組織。

1947 年 8 月浙江嵒山和福建武夷山「通天會」法師李子章、朱重光（化名林云），因被國民黨政府通緝，因此也逃到平潭。林超凡邀請李、朱至君山頂國清院活動，並將大刀會改名為通天會。後續因李、朱離開平潭而終止。

⁸¹ 張馳，〈軍統閩海軍運直屬組〉，頁 24-54。

⁸² 戰後的戰爭責任歸屬，參見顧若鵬（Barak Kushner）著，江威儀譯，《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新北：遠足文化，2021）。

⁸³ 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安廳政治保衛科，《福建省反動會道門概況》，頁 34。當時出現許多勢力往來於香港與臺灣之間，以支援反共游擊隊的名義向臺北要求金援。這些游擊勢力番號眾多，國府處置也由原先通通有獎的補助政策，逐步走向或「自給自養（自生自滅）」或「收編」進國軍部隊。參見〈保密局謊報游擊部隊人數捏造番號之真相〉，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文物》，檔號：005-010208-00020-005；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現代臺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⁸⁴ 平潭政協文史組整理，〈大刀會暴動記〉，頁 53-54。

1949年2月 林蔭與林超凡，選派平潭大刀會成員前往嵒山島，向法師朱重光學習「通天會」、「白雲會」刀法，並在平潭各地建立刀會組織。4月國府撤銷對李、朱與陳友昌的通緝，王調勳佈置陳友昌成立地下組織。7月，國民黨73軍佔領平潭。大刀會陳友昌由廈門來平潭，刀會法師朱重光、李子章也來平潭，與73軍軍長李天霞、平潭大刀會首領林超凡等開「應變會議」。⁸⁵

上文提及的人員，經過個別考訂後，基本都不曾在中共當局的管控下。文中敘述之大刀會組織如何自福安傳入平潭，並進一步與中共政權的敵對勢力（包括國民黨軍隊與海匪力量）建立直接的從屬指揮關係，此一明顯有強烈因果關係的敘述，經過考訂也證實是中共地方政權自說自話的狀況。據軍統要人毛森的回憶錄，他的確於1949年夏天在福州部署過福州當地的相關軍統人員，並任命了幾位軍統人士負責「應變」。但從1949年8月後的發展，毛森的佈置並沒有發揮成效。⁸⁶

1949年4月的渡江戰役後，8月17日共軍進入福州並宣告解放，8月24日福州新政權正式建立。這一週的時間差，主因是8月24日從山西來的南下幹部方才抵達福州，⁸⁷於9月2日被派往福州周邊縣市去進行「政權接管」。福建省委對南下幹部的接管工作有方針如下：

到達福州後，省委給我們佈置了3項任務：1.會師接管，2.籌糧支前，3.整理游擊隊。……接管工作，華東局和省委有明確的方針，那就是：自下而上，原封不動，先接後管，逐漸改造。按照省委的部署，我們提出3項接管任務：1.迅速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建立革命新秩序；2.抓緊調查研

⁸⁵ 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安廳政治保衛科，《福建省反動會道門概況》，頁34。

⁸⁶ 林成基，〈毛森來閩組織「反共救國軍」〉，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軍統在福建：福建文史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頁244-249；毛森，《毛森回憶錄》（作者自印，未刊稿）。

⁸⁷ 郭天印，《長江支隊：1949年南下全景紀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究，摸清情況，有準備有秩序地接受舊政權機構，妥善處理舊職員；3.國民黨政府經營的工廠企業接收以後，應盡快復工復業，慎重合理解決勞資關係問題。⁸⁸

三項任務可以簡化為接管、籌糧與整理游擊隊。其中最引起這群外來幹部戒心的，是與本地政治勢力競爭的問題：

當時同我們聯絡的地下黨有閩中地委的，有原省委城工部的，有解放前後才發展的黨員，還有一些來歷不明自稱是共產黨的人。他們來反映狀況時都相互視為異己，互相攻擊謾罵，甚至發生斗毆現象。在籌糧中，各有各的辦法：有籌借黃金的，有籌豬肉酒菜的，有籌了糧食挪作他用的，甚至拿去放帳的。……總之，開頭一段時間在思想上、組織上、政策上、工作上都相當混亂，南下幹部儘管看不慣，但怕影響團結，怕會師後被看作「欽差大臣」，大多採取了遷就態度。⁸⁹

這群「地方游擊隊」的武力基礎讓新政權格外忌憚。但對當地百姓而言，為了支應即將到來的金門戰事，當地百姓的負擔亦急速地增加：

按後勤部門估計，解放閩南，除各軍就地籌糧外，還需補充糧食3,000多萬斤，柴草4,700萬斤。如此艱鉅的籌糧任務，理所當然地應由已經解放的閩東、閩北人民承擔起來。⁹⁰

軍方提出的糧食需求數量相當驚人，對於已經多次有與「外來政權」交手經驗的閩東閩北百姓，自然不可能把這樣沈重負擔視作「理所當然」。新到的中共政權必須設法說服百姓支援戰事。中共新政權推出以戶為單位的「臨時借糧辦法」：

⁸⁸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191-193。

⁸⁹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194。

⁹⁰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196。

以戶為借糧單位，以付額為借糧標準。每戶付額不足 4 角者免借，4 角以上每戶借糧最低不得少於 20 斤，最高不得超過 100 斤，由各專屬依據當地土地肥瘠、產量多寡、人民生活狀況，具體擬定累進辦法，……每借糧一斤，並借公柴一斤。⁹¹

雖說以借為說詞，實際上仍是徵用。辦法內容雖強調公平，自然有共產新政權想讓當地百姓耳目一新的政治宣傳目的，但細讀此一政策的內容，可以發現推行這項辦法必須高度仰賴地方社會的主動配合與充分的地方知識。然而，這群來自山西的福建幹部只有在山西省強硬推動土改的鬥爭經驗，⁹²且現下也僅有兩個月時間來完成軍方的額定任務。在人地與資訊兩相不熟的狀況下，施政的挫敗在所難免。截至同年10月5日任務結束為止，除了靠海的平潭與山區的永泰兩縣外，整個閩北與閩東地區送交的糧食為 1,650 萬斤，僅達軍方要求的一半。當時地方出現的抵抗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帝國時期已常見的欺瞞（包括隱戶與析戶）等手法，⁹³另一則是憑藉武裝組織力量與新政權進行對抗：

解放初期，全省武裝匪特有四萬多人，閩侯地區大約有 5,500 人。這些殘存在福建境內的土匪、特務、惡霸三位一體的反革命武裝，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危害極大：他們與當地地主、惡霸、反動幫會相互勾結，攻打區、鄉政府，襲擊我下鄉工作隊，殘殺農會幹部，使幹部群眾惶惶不安，工作無法正常開展。……他們還造謠惑眾，貼出反動標

⁹¹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 197。

⁹² 中共建國之前於山西推行的土改政策，參見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近期學界討論，參見陳耀煌，〈革命的季節性：1950 年代前期河南省農村的群眾運動〉，《新史學》，33：2（臺北，2022.6），頁 133-189。

⁹³ 帝國時期農民逃避稅收方法的討論，參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1949 年後之討論，可參見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語，煽動「反徵糧、抗派伕」，甚至攔截車船，劫掠物資，千方百計破壞籌糧支前工作，妄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⁹⁴

地方武裝組織與不同的政權間對抗，因此遭到「匪化」的處理，對當時與之前的福建，乃至於中國其他區域的百姓而言，都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對平潭縣的百姓而言，新近遭到解放軍擊敗的蔣介石政權 75 軍過境平潭縣境時，強硬拉伕與徵糧對地方造成的傷害仍是記憶猶新。⁹⁵1949 年 10 月底的金門渡海戰役（古寧頭戰役）失敗後，為了準備 1950 年 4 月再戰金門的軍事行動。省方將施政重點放在短時間內徵集足夠資源以支援戰爭。此次，中共中央對福建部署了遠超過北伐戰爭的大規模外來軍事力量準備去強行壓制不同的地方武裝組織對新政權的挑戰：

自 1949 年 8 月起，第 10 兵團兼福建軍區及抽調大批野戰軍、地方武裝、民兵同人民群眾一道開展尖銳複雜的剿匪鬥爭，至 1951 年 3 月，福建全省股匪基本肅清，毛澤東主席兩次電報嘉勉，……第 10 兵團還派出 1 萬名幹部戰士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將剿匪與土改、鎮壓反革命、建立與鞏固地方基層政權結合運行，進一步穩定了社會治安、鞏固了地方政權、……。⁹⁶

透過上文，我們可以看到進入福建省境內的軍隊，除了準備金門渡海戰役外，主要的任務是翦平地方武裝組織的「剿匪鬥爭」。古寧頭戰役失敗後，中共政權內部檢討認為除了與後勤補給不足有直接關係，也同時孳生了對境內潛在敵對勢力的戒心。同一時間，蔣介石政權的海空軍在美軍掩護下得以封鎖中國沿海，並造

⁹⁴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 203-204。

⁹⁵ 關於 75 軍對平潭縣區造成的問題，參見：〈平潭戰役報告案〉（1949 年 5 月-1950 年 8 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38/0503/1040。

⁹⁶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軍事志》，頁 9。

成福建的糧荒。當時不光是軍糧補給，就連福州也因海上交通斷絕而爆發嚴重的糧荒：

1950年春季，全區斷糧戶占20%，青黃不接戶占30-40%。糧食問題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當時尚未進行土改，廣大城鄉土地租佃關係仍然存在；前線駐軍待命解放臺灣，仍然需要糧草供應；外省和外地區又不可能調進糧食支援我們。怎麼辦呢？我們考慮只有兩個辦法，一是發動群眾生產度荒，一是迅速開展減租反霸鬥爭。⁹⁷

上述因素加總後，中共福建新政權決定加速推動福建的土地改革。為了解決土地改革的阻礙，除了以剿匪之名去清除各地既存的地方反對勢力外，也著手建立新的地方權力體系。具體做法是：1950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決定在閩侯地區推動廢除1935年以來運作的保甲制度，冀圖徹底翦除地主階層在地方社會中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建立新的替代地方組織：

召開區、鄉農代會、人代會是改造基層舊政權的最好工作辦法，也是建立民主政體的最好組織形式。這個方法運用得好，對全面地徹底廢除保甲制度會起很大的推動作用。農代會、人代會不能變成積極分子會議，也不能變成幹部請客會，應該注意代表性與權威性。⁹⁸

在地方社會中推行新的組織方式，雖說仍有相當多的挑戰，但結合土改並以民主建政為名建立的新組織，對原先的地方權力體系帶來相當明顯的競爭壓力，更遑論這個新的權力組織是以成功壓制地方勢力的正規軍隊為主要的憑藉。中共在福建省建立的過程，除了強調進步史觀之單一、樂觀，並與民族主義重疊的宏大敘事外，也往往是大面積地遮蔽「大政府」建立對地方社會成員日常生活造成的衝擊。值是之故，我們也應該再分析細察 1950 年

⁹⁷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209-210。

⁹⁸ 溫附山，《往事千秋》，頁216-217。

的平潭大刀會起事對地方造成的衝擊，以及地方版本的具體善後措施：

1950年2月17日，晨，平潭大刀會暴徒1,021人，以向解放軍拜年為名，兵分三路襲擊縣城、官井、后田解放軍駐地。解放軍予以反擊，迅速平息大刀會武裝暴動。3月，成立平潭縣農民協會。4月，全縣各縣建立民兵組織，至九月底，全縣共組織民兵955人。……12月6日，東昆（農區）與芬尾（漁區）開始推動土地改革試點工作，歷時兩個月。同月，成立平潭縣總工會，首批招收會員80多人。……同月，流水民兵隊長周玉順帶領10多名民兵隨部隊前往東庠搜剿散匪，……周玉順勇敢擒敵，被評為全國民兵模範。1952年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民兵模範會議，10月1日參加國慶觀禮活動。⁹⁹

大刀會起事雖被中共地方政權稱為「血的教訓」，但實際仍是地方社會成員組成的大刀會武裝被新來的解放軍部隊輾壓式剿滅。等於說，此一血的教訓不光對中共新政權，同時更是對地方社會起了殺雞儆猴的寒蟬效應。過往憑著精神動員與密集衝刺的大刀會，已無法繼續成為地方百姓用以組織、武裝自己對抗外來勢力的「有效」組織形式。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此次的大刀會事件結束後，可以說中共平潭當局已經公開壓制了1944年以來由前縣長林蔭或應為同善社領袖林超凡所建立的大刀會組織。隨後，平潭地方陸續建立了農民協會、總工會與民兵等新的地方人群組織。除了武裝組織地方領袖的更迭外，更關鍵的變化是以大刀會武裝組織的動員能量，出現被中共當局建立的民兵體系吸收並取代的現象。下文以出身平潭漁民家庭，1952年當選全國民兵模範的周玉順（1929-?）生涯發展去進行此一問題的討論：

平潭島於1949年9月解放之後，海匪活動頻繁，他們一邊勾

⁹⁹ 福建省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潭縣志》，頁24。

結島上的地主、惡霸，一邊暗通馬祖島國民黨特務、軍警、不斷打劫漁村，搶劫漁船。離縣城較遠的東庠島和流水海區，匪患尤其猖獗，居民不得安生。加上1950年2月17日平潭島發生大刀會暴動，反革命氣焰囂張。周玉順出自保護人民新生政權的強烈責任感，……主動把流水村10多個青年漁民組織起來，於這年3月間成立流水民兵隊，由他擔任隊長，得到區人民政府的支持。¹⁰⁰

大刀會事件遭到鎮壓後，由漁民轉化成民兵的周玉順對共產新政權的幫助，透過官方說法的鋪陳，自然是不在話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取得武裝的方法，除了與周遭治安狀況與時代等條件變遷有關外，更與當地的文化權力網絡支持有直接因果關係：

剛成立的民兵隊，赤手空拳，沒有武器，大家都感到為難，於是想出一個辦法：向民間收繳零星的武器。1949年9月臨解放前，國民黨73軍從流水港口倉惶潰逃入海，丟下不少槍支彈藥，散失在一些漁民手裡。周玉順帶領隊友們，在流水村挨家逐戶訪問調查，向群眾講明對敵鬥爭需要武器，用於保護海防，保護漁業生產。……單是1950年，周玉順民兵隊就收繳到步槍26支、自動步槍1支、輕機槍1挺、手榴彈39枚、各式子彈7,300餘發，還有3部電話機。¹⁰¹

除了結合地緣去取得武器以擴張實力外，平潭民兵體系的發展非常地迅速，到了1950年12月間，「沿海的重點地區都設哨巡邏，……到了1953年底，全縣共有55處民兵崗哨，配備武器彈藥，日執勤民兵達500多人」。¹⁰²與先前活躍之強調精神動員，但僅配備有冷兵器的大刀會相比，這一批隨共產新政權崛起的地方

¹⁰⁰ 劉增泉、念克謙、陳國俊，〈全國民兵模範周玉順事跡〉，收入政協福建省平潭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潭文史資料》第十一輯（平潭：內部發行資料，1997），頁36-38。

¹⁰¹ 劉增泉、念克謙、陳國俊，〈全國民兵模範周玉順事跡〉，頁37。

¹⁰² 念克謙、陳國俊，〈建國初期平潭民兵組織概況〉，收入政協福建省平潭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潭文史資料》第十一輯，頁31。

武裝團體實力不容小覷。隨著解放軍大批入閩，加上新建立的地方民兵體系，並搭配 1950 年底啟動的鎮反運動，往常會遭遇到地主強烈抵抗的土地改革自然也就可以開始漸次推行。如此的地方權力體系變遷，體現在 1950 年 9 月底平潭縣針對大刀會事件召開的公審會內容：

1950 年 9 月 28 日，平潭縣人民法庭（當時尚未成立縣法院）召開宣判大會，依法判處大刀會首犯吳國柏死刑。1951 年 2 月 4 日 21 時，全縣統一行動，於 2 小時內逮捕匪首、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等 233 人。縣政府組織縣人民法庭，並分區設立 4 個分庭，召開公審大會，判處 47 名反革命份子死刑。¹⁰³

平潭縣後續對縣境內大刀會的全面追剿措施，一直持續到 1953 年才結束：

1951 年，……逮捕了一批大刀會頭目、骨幹、同時繳獲了大刀會法衣、法帽 400 多套，經書 198 本，佛像 60 多張，會旗 3 面，符紙約 1,000 多張，銀元 1,444 枚，以及其他些罪證。1952 年 4 月，……全面開展取締會道門運動，……逮捕了殘存的有罪惡民憤的大刀會頭子 7 名，逮捕回外逃的大刀會頭子 3 名，爭取回來自首的 1 名。……繳獲大刀、長矛的 526 支，法衣、法帽 453 套，銀元 2,384 枚，道會經書 29 冊，道器（法器）321 件。……依法審處反動會道門頭子 101 名，其中判處死刑 32 名、有期徒刑 43 名，管制 26 名。¹⁰⁴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執行中立化臺灣海峽的任務，連帶造成中國東南沿海再次進入類似鎖國海禁的時代。¹⁰⁵

¹⁰³ 福建省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潭縣志》，頁 24-25。

¹⁰⁴ 李鵬雲，〈平潭大刀會的暴動與平息〉，收入政協福建省平潭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潭文史資料》第十一輯，頁 53-54。

¹⁰⁵ 關於韓戰爆發後，中華民國與美國聯合推動的封鎖中國沿海行動，可見布魯斯·艾里曼（Bruce A. Elleman）著，吳潤璿譯，《看不見的屏障：決定臺灣命運的第

海岸線遭到封鎖，也讓中共新政權得以運用人民民主之名去進一步清理地方社會中的反對勢力，自十九世紀以來就在本地擁有影響力的地方武裝組織（如大刀會）自然成為當局的立威的首要目標。細讀上文公審的內容可知，無論就逮捕與處死人數、查獲的武器數量，都可以發現大刀會的實力被過度地誇大。因此，此一公審並不是追求正義，而是要向地方社會展示共產新政權鎮壓大刀會的事實。透過此一舉措去達到去除其民間威望的宣傳效果；但如此大費周章地對單一民間組織進行掃蕩，倒也證明了大刀會的地方實力。

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這一年多的時間，可說是中共福建新政權與福建地方社會互相探索底線的時期，但隨著對金門用兵失利與1950年6月韓戰爆發，此時平潭大刀會事件確實讓中共福建政權感到更大的競爭壓力。為何要劍指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地方人群組織，主要也與1950年韓戰爆發後的「經濟保衛工作」有關：

開展全國規模的經濟保衛工作，必須克服許多困難。第一個重要的困難是有一部分職工的覺悟程度不夠高，還有些特務份子混在職工中間。特別是廣大新區的經濟建設部門中，情況更為複雜。反動黨團組織還未能徹底摧毀，封建迷信與幫會則普遍存在，這很可能成為敵人特務活動的基礎。¹⁰⁶

為了鞏固政權，中共於1950年10月10日啟動了將近三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除了軍事鎮壓外，對於存在民間的武裝勢力，進一步於1951年2月20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條文定調：「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採取「首惡者必辦，脅

七艦隊》（新北：八旗文化，2017）。

¹⁰⁶ 人民日報1950年7月9日社論，〈加強經濟保衛工作〉（原載《人民日報》1950年7月9日社論），收入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新華時事叢刊：第87種·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頁70-71。

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執行態度。¹⁰⁷這些嚴刑峻法是否真能完全清除這些民間勢力的影響？以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資料而言，1965年3月20日，大刀會組織又再次出現在平潭的地方歷史中。在縣公安局宣稱破獲的一起大刀會復辟活動案件報告中，聲稱抓獲成員66名，並涉及全縣5個公社、11個大隊、14個自然村。顯然大刀會此一人群組織並未消失，且還值得去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

結語

英國著名左派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於1970年代對社會型盜匪歷史的討論中，提出以下的觀察：

近兩百年來，人類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現象，就是由前資本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於是在社會變遷轉型的過程中，一向係培養盜匪溫床的農業社會遭到徹底毀滅，……十九、二十世紀之於世界許多地方，正如十六、十七世紀之於大部分歐洲一般，可謂盜匪的盛世。可是如今除了極少數特例之外，多半都已絕跡。¹⁰⁸

本文所揭示的歷史過程指出：大刀會組織是由農民所組成，此一武裝組織對現代民族國家造成的威脅，的確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迅速減弱或至少發生轉型的現象。在針對組織邏輯的討論上，霍布斯邦雖運用領袖氣質與社會模式等方式，理論化他所研究的盜匪所發揮的組織人群作用，但最大的問題在於，基於其左派論點，他有意地輕忽了宗教活動在日常生活與地方政治的影響。霍

¹⁰⁷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新華時事叢刊：第87種·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頁10、17。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建政後，陸續面對許多來自外部韓戰、國內施政的挑戰，從而出現對自身權力感到普遍焦慮的現象，主要展現在對內尋找所謂的潛在敵人並以嚴刑峻法對付。值得玩味的是，他們多次引用史達林所言：「國家威力越增長，垂死階級最後餘孽的抵抗也會越猛烈」，正當化其鎮壓措施。可見人民日報社論，〈徹底糾正曲解「寬大政策」的偏向〉（原載《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6日社論），收入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新華時事叢刊：第87種·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頁56-60。

¹⁰⁸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鄭明萱譯，《盜匪》，頁13。

氏的觀察自有其啟發性，但卻無法解釋與脈絡化我們從事地方歷史研究時，在資料與田野中所能察覺到的諸多現象。透過本文對二十世紀初期以來，閩北與閩東地區民間武裝組織與地方社會發展史的重新編織，我們可以發現出現在閩北與閩東地區的大刀會組織是當地百姓結合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發展的團練制度，並搭配大刀會的宗教色彩與兄弟互助組織傳統，所形構出他們面對二十世紀地方變局的人群組織模式與邏輯。大刀會成為百姓以宗教為重要支撐，強調自主性、並的確可與外來政治勢力對抗的地方武裝組織。對於此一動態的權力互動關係對我們思考歷史的啟發，霍布斯邦提出的「平行體系」看法，就很值得參考：

由於西西里島農民的家園是最出類拔萃的莊園農場經濟的國度，故而他們自古以來即生活在雙重的威權之下：一個是遙遠且通屬於外國的中央政府威權，另一個是當地的奴隸主或封建領的威權。……他們不識之無且與世隔絕的生涯，一直是在擺著惡霸姿態，手下養著扈從食客的領主與屬於農民本身的自衛性習俗和制度這兩者間的對峙中度過。因此，……某種可稱為「平行體系」的狀態是一直存在的。¹⁰⁹

透過本文對大刀會——特別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在閩北與閩東地區發展歷程的討論，我們看到福建地區的大刀會並不是一個神秘的反政府的秘密暴力組織，而更接近是「農民本身的自衛性習俗和制度」所建立的民間大眾組織。常見於史料中對這類組織的敘述，往往是強調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從而賦予落後農民組織的刻板印象，低估其因應時勢變化的能動性。但如本文所示，此一民間的武裝組織一路從十九世紀中以來，就一直在地方持續發揮作用、並也持續產生變化的地方人群組織。

本文將大刀會此一民間武裝組織的發展嵌入二十世紀上半葉閩北與閩東的地方社會發展去進行觀察，去具體討論此一大眾組

¹⁰⁹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楊德睿譯，《原始的叛亂》，頁59-60。

織如何為當地民眾，在不同世代面對的問題中提供解方。這也可見於早先閩北大刀會的興起，是當地百姓為了解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地方軍事化產生的民團與地方軍閥殘部對百姓日常生活所造成的生存威脅。再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我們也因此可以發現即便是號稱相對富庶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鄉間生活也絕非是儒者耕讀傳家的和諧社會，因為生存資源競爭與不同外來勢力介入所產生的暴力與武力對峙乃是鄉間生活的重要日常。¹¹⁰透過本文對大刀會作為一個福建地方武裝組織發展歷程的討論，亦足證重要史家孔飛力（1933-2016）教授所言：十九世紀中以後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政權與社會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朝代循環模式去進行重建的歷史觀察。¹¹¹

本文以由下而上的歷史並結合微觀史的方法，揭示了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地方武裝人群組織如何成為福建百姓用以面對不同生存危機問題的歷史變遷過程。所討論的閩北與閩東兩地，在陳儀擔任省主席後，特別是在中日抗戰期間，大刀會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與社會之間一個重要的中介組織與緩衝機制。大刀會組織成為當地百姓的救命符，藉以抵抗政府的拉伕與徵糧；面對日本殖民帝國的經略，則展現出追求與自我定義現代化的努力。1950年2月的平潭大刀會起事向中共新政權展示了1920年代以來大刀會組織在福建地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卻也錨定了現代共產國家全面壓制這股民間力量的起點。過往常言這類帶有宗教色彩的武裝人群組織已被中共所建立的地方組織與民兵制度所取代，但如同在田野與文獻中可見，宗教元素所能發動的精神與信仰的力量卻仍繼續以不同的形式在當地持續發揮影響力，此一發展亦值得學者後續關注。¹¹²這此間如何運用地方社會發展的角度，去重探特別

¹¹⁰ 如 Robert Darnton 透過對中世紀的農村生活的研究所言：「農村根本就不是什麼快樂和諧的共同體」。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 26.

¹¹¹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

¹¹² 類似問題的討論與切入點，參見張彥（Ian Johnson）著，廖彥博譯，《中國的靈

是 1950 年至 1980 年代中地方人群組織的發展邏輯與組織動能，會是一個非常值得日後分析的學術問題。

（責任編輯：梁詠誠 校對：呂唯愷）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一）檔案

〈平潭戰役報告案〉（1949年5月-1950年8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0503/1040。

《軍事委員會公布華胄榮譽獎章給予辦法訓令》（1938年4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訓令，銓（三）漢字第三六九〇号。

「保密局謊報游擊部隊人數捏造番號之真相」，〈保密局謊報游擊部隊人數捏造番號內容要點及真相〉，《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8-00020-005。

「羅仲若人事資料」（1907.7），〈羅仲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00000-3801。

（二）史料彙編

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第十輯，平陽：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

平潭縣比干文化研究會編，《平潭林氏通鑒》，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

申仲銘編著，《中華民國資料叢稿（增刊）：民國會門武裝》，北京：中華書局，1984。

吉朝陽、武忠明編，《陽城文史資料：第14輯·南征閩疆：長江支隊陽城南下福建幹部專輯（下）》，晉城：政協山西省陽城縣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2005。

吳世生，〈清名碩望的賢紳楊頌南〉，收入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政和縣文史資料》第四輯，頁55-56。政和：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1994。

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經濟作戰》，臺北：國史館，2011。

林守無主編，《福鼎縣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3。

林成基，〈毛森來閩組織「反共救國軍」〉，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十八輯，頁數。福建：福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244-249。

政協浙江省蒼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第七輯·大刀會始末》，蒼南：編者印行，1992。

政協福建省平潭縣文史資料編輯組編，《平潭文史資料》第二輯，平潭：內部發行資料，1982。

徐興祖等，〈憶閩中沿海突擊隊〉，頁1-7。

平潭政協文史組整理，〈大刀會暴動記〉，頁53-54。

政協福建省平潭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潭文史資料》第十一輯，平潭：內部發行資料，1997。

念克謙、陳國俊，〈建國初期平潭民兵組織概況〉，頁31。

劉增泉、念克謙、陳國俊，〈全國民兵模範周玉順事跡〉，頁36-38。

李鵬雲，〈平潭大刀會的暴動與平息〉，頁53-54。

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福建文史資料》第二輯，福建：福州人民出版社，1963。

郭則傑，〈福建軍統戰時經濟管制機關：貨運管理處〉，頁112-113。

薛俊駒，〈福建和平救國軍內幕〉，頁117-129。

范強，〈略述政和縣大刀會勢力的崛起與衰亡〉，收入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政和縣文史資料》第二輯，頁70-79。政和：政協福建省政和縣委員會，1982。

范強、中共政和縣黨委史辦，〈閩北紅軍與建松政「大刀會」結盟的情況〉，收入吳其樂主編，《閩北黨史研究文論選》，頁221-229。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

國民大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臺北：國民大會秘書處，1961。

婁啟鈞，〈閩北大刀會匪林乃導被捕前後追記〉，收入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二卷·社會民情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461-462。

張從典，〈劉和鼎部隊駐閩情況概述〉，收入中國人民政協福建省建甌縣

- 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建甌文史資料》第一輯。建甌：內部發行資料，1980，頁37-46。
- 陳昌穎，〈盧興邦統治南平時期的文教事業〉，收入福建省南平政協文史組編，《南平文史資料》第三輯。南平：政協福建省南平市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82，頁50-51。
- 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州市志》第一冊，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 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安廳政治保衛科，《福建省反動會道門概況》，福州：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安廳政治保衛科印、福建省圖書館藏，1951。
- 福建省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潭縣志》卷20、36，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軍事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 福建省政協、泉州市政協、漳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閩南民軍：福建民軍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何健魂、蔡爾輦，〈石獅土皇帝蔡持〉，頁65-68。
- 張家瑜，〈陳佩玉其人其事〉，頁117-124。
- 洪駁麟，〈陳國輝湖洋屠村梗概〉，頁183-186。
- 陳其輝，〈陳國輝屠劫永春鰲峰簡述〉，頁187。
- 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四卷·政治軍事編》第四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張 馳，〈軍統閩海軍運直屬組〉，頁24-54。
- 張 馳，〈福建和平救國軍張逸舟部瑣聞〉，頁65-67。
- 原壽梓，〈軍事委員會南竿先遣隊概況〉，頁111-112。
- 閩北分蘇人民文化委員會印，〈反大刀會宣傳大綱（1932年2月26日）〉，收入中共福建省建陽地委黨史辦、福建省建陽地區檔案館編，《閩北黨史文獻》第二集，頁139-141。南平：中共福建省建陽地委黨史辦，1984。
- 潘 群主編，《福州老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 鄭添恩，〈抗戰期間海匪六次血洗平潭島〉，收入政協福建省委員會文史

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福州：福州市政協，1992，頁163-170。

黎 昕、徐曉望編，《平潭歷史文化概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饒守坤，〈結盟〉，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編，《風展紅旗》第六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 108-115。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毛 森，《毛森回憶錄》，作者自印，未刊稿。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3-1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澤東，〈流氓問題：紅四軍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案，1930年6月〉，收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補卷》第三卷，頁 135-139。東京：蒼蒼社，1984。

唐縱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

郭天印，《長江支隊：1949年南下全景紀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陶成章，〈浙案記略〉，收入湯志鈞編，《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32-342。

溫附山，《往事千秋：溫附山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葉 飛，《故鄉征戰紀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

二、近人專書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鄭明萱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臺北：麥田出版事業公司，1998。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楊德睿譯，《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臺北：麥田出版事業公司，1999。

丁光玲，《清代臺灣義民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新華時事叢刊：第 87 種·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北京：新華書店，1951。

-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著，林添貴譯，《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5。
- 中國會道門史料集成編纂委員會編，《近代會道門史料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著，何啟仁譯，《戰火中國 1937-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暴與崛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
- 王崧興，《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
- 布魯斯·艾里曼 (Bruce A. Elleman) 著，吳潤璿譯，《看不見的屏障：決定臺灣命運的第七艦隊》，臺北：八旗文化，2017。
- 朱 英，《近代中國商會、行商及商團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著，鐘逸明譯，《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
- 貝思飛 (Phil Billingsley) 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周建超，《秘密社會與中國民主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 林亦修，《溫州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現代臺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
- 芮納·米德 (Rana Mitter) 著，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揭開你所不知道的八年抗戰》，臺北：天下文化，2021。
- 邱國珍，《浙江畚族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
- 洪長泰著，麥惠嫻譯，《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

- 胡盛華，《盧興邦傳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 孫江，《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新北：博揚文化出版公司，2016。
- 徐有威、貝思飛主編，《洋票與綁匪：外國人眼中的民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秦寶琦，《清末民初秘密社會的蛻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 秦寶琦、譚松林，《中國秘密社會》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張彥（Ian Johnson）著，廖彥博譯，《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臺北：八旗文化，2019。
- 梁勇，《移民、國家與地方權勢：以清代巴縣為例》，北京：中華書局，2014。
- 莊吉發，《清代臺灣會黨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9。
- 連立昌，《福建秘密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 郭天印，《長江支隊：1949年南下全景紀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 陸仲偉，《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馮筱才，《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 馮筱才，《「戰時繁榮」：1937-1945年溫州的經濟貿易及其統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 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1937-1945》，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

劉革學編著，《中國土匪大結局：第一部中國近代土匪活動野史》，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

蔣伯英編，《福建革命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鄭永華、趙志，《近代以來的會道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鄭維中（Cheng Weichung）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新北：衛城出版，2021。

戴玄之，《紅槍會（1916-1949）》，臺北：食貨出版社，1973。

謝 湜，《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歷史和海島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顧若鵬（Barak Kushner）著，江威儀譯，《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新北：遠足文化，2021。

三谷孝著，李恩民等譯，《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上田信著，葉韋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加藤陽子著，賀申杰譯，《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與軍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

加藤陽子著，黃美蓉譯，《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新北：遠足文化，2016。

村上衛著，王詩倫譯，《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松田良孝著，蘆荻譯，《被國界撕裂的人們：與那國·臺灣往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濱下武志著，李侑儒等譯，《海的亞細亞：濱下武志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新北：大家出版，2023。

- Darnton, Rober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 DuBois, Thomas David.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 Duus, Peter. Ramon Myers, &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Faure, David. & Xi He eds., *The Fisher Folk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Boat-and-shed Liv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Goossaert, Vincent. &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Kuhn, Philip A.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Lipman, Jonathan. & Stevan Harrell eds.,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 Ownby, David. *Brotherhood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erry, Elizabeth.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 Perry, Elizabeth.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Schoppa, Keith R.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cott, James.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zonyi, Michael.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agliacozzo, Eric. Helen F. Siu, &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Tagliacozzo, Eric. Helen F. Siu, &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Tagliacozzo, Eric. Helen F. Siu, &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Itinerant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三、近人論文

王秀惠、潘榮陽，〈淺析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福建大刀會活動的社會功能〉，《龍岩學院學報》，25：4，龍岩，2007.8，頁56-58。

王見川、康豹、宗樹人，〈導言：救世團體研究的回顧〉，《民俗曲藝》，172，臺北，2011.6，頁13-20。

代雅潔，〈華北解放區南下幹部與南方新區鄉村土改研究（1948-1952）〉，《中國經濟史研究》，2019：2，北京，2019.4，頁177-192。

朱海濱，〈九姓漁民來源探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1：2，西安，2006.4，頁51-59。

池龍威，〈福鼎大刀會研究（1937-1953）〉，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21。

佐藤仁史，〈近代江南の漁民と天主教〉，《歷史評論》，765，東京，2014.1，頁37-46。

李宇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日海運在亞洲國際海域的競爭（1936-193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3，臺北，2011.9，頁53-97。

李恩涵，〈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37-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臺北，1999.6，頁133-165。

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2005：2，北京，2005.5，頁81-92。

林春蓉、潘榮陽，〈福建大刀會活動因素論〉，《黎明職業大學學報》，

- 47，泉州，2005.6，頁77-80。
- 許彬、陸發春，〈中共福建革命與大刀會組織研究（1931-1938）：以閩北和閩東為中心的考察〉，《蘇區研究》，2022：5，南昌，2022.9，頁51-63。
- 陳耀煌，〈革命的季節性：1950年代前期河南省農村的群眾運動〉，《新史學》，33：2，臺北，2022.6，頁133-189。
- 陳耀煌，〈民國時期的農村社會與地方強人：傅柏翠與閩西地區〉，《東吳歷史學報》，29，臺北，2013.6，頁59-114。
- 傅衣凌，〈《王陽明集》中江西的「九姓漁戶」（休休室讀史札記之一）——附論江西九姓漁戶與宸濠之亂的關係〉，《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1，廈門，1963.3，頁63-68。
- 黃向春，〈身份、秩序與國家：20世紀50年代閩江下游地區的「水上人」與國家建構〉，《開放時代》，2019：6，廣州，2019.12，頁182-200。
- 黃向春，〈清代福州的「蜑民」與地方社會：以一通嘉慶碑銘為中心的歷史「厚描」〉，《學術月刊》，51，上海，2019.8，頁168-178。
- 劉一民，〈福建底民團與農村〉，收入李文海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社會組織卷》，頁66-7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123）〉，《傳記文學》，64：4，臺北，1994.3，頁136-138。
- 劉鳳翰，〈日軍侵華期間偽軍的興起與蛻變〉，《國史館館刊》，18，臺北，1995.6，頁187-220。
- 繆慈潮，〈建國初期閩東取締大刀會情況概述〉，《黨史研究與教學》，97，福州，1991，頁36-39。
- 羅士傑，〈地方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所近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3，頁159-202。
- 羅士傑，〈抗戰晚期的民變與地方社會：以平陽大刀會與同善社為討論中心〉，《漢學研究》，36：2，臺北，2018.6，頁217-249。

Harrell, Stevan. "From Xiedou to Yijun, the decline of Ethnicity in Northern Taiwan, 1885–1895."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June, 1990), pp. 99-127

Ownby, David.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Vincent Goossaert, Jan Kiely, and John Lagerwey, eds.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1915* vol. 2. Leiden: Brill, 2016, pp. 685-750.

Ownby, David. "The Ethnic feud in Qing Taiwan: What is this violence business, anyw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782 Zhang-Quan Xiedou."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June, 1990), pp. 75-98.

四、網路資料

劉家國等編，《連江縣志》，〈<http://gov.matsu.idv.tw/lienchiang/military.html>〉，（2024/2/28）。

Armed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Societ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 Case Study of Dadaohui in Northern and Eastern Fujian (1927-1950)

Lo, Shih-ch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ebruary 1950 uprising of the Dadaohui in Pingt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o examine several issues. What w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Dadaohui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1950? What roles did local arm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Dadaohui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Fujian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y did newly established Communist authorities claim a direct causal link between these easily suppressed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s and the residual forc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f we understand the Dadaohui uprising as part of a longer history of poli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society and successive regimes in Fujian, what changes in discourse and power structures does this allow us to identify?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ous regimes in Fujian and mass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been active there since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daohui and redemptive societies such as the Tongshanshe?

This study adopts a bottom-up approach and a mi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seeks to illuminate the broader dynamics through close analysis of local detail. By reconstructing specific local historical contexts, it challenges earlier one-sided, top-down political condemnations and reconsider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adaohui as a grassroots mas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in northern and eastern Fujian, tracing its evolution from a social-bandit group defending local interests to what was later labeled a “reactionary heterodox organization.”

Keywords: Dadaohui (Big sword Society), armed organizations, northern Fujian, eastern Fujian, local politics, 1950